

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诞辰280周年纪念文集

潘捷军主编

鲍永军副主编

杭州出版社

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 编

ZHANG XUECHENG
YANJIU GAILIAN

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诞辰280周年纪念文集

潘捷军主编
鲍永军副主编

杭州出版社

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章学诚研究概览：章学诚诞辰280周年纪念文集 /
潘捷军主编. —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65-0929-4

I. ①章… II. ①潘… III. ①章学诚 (1738-1801)
— 纪念文集 IV. ①B249.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28617号

章学诚研究概览

——章学诚诞辰280周年纪念文集
潘捷军主编 鲍永军副主编

责任编辑	蒋晓玉
封面设计	王立超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网址：www.hzchs.com
排 版	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国广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5-0929-4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阐“旧邦”以辅“新命” (序言)

王永昌

江浙一带自古名人辈出，绍兴更是名士之乡。章学诚是绍兴名人中的耀眼之星，也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绕不过去的一段航道。他一生教书与著书，史学研究和编撰方志成果丰盛，尤其是他开创的中国方志学，更为后人赞颂，被公认为中国史志界的一枝奇葩。

章学诚（1738—1801）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及方志学家。其祖父和父亲均为文人，皆熟读中国经典史书文献。其父考取进士，候缺十年后才入鄂为应城知县，但不足五年便因故被免官，此后在湖北诸地教书写志，直至客死他乡。章学诚从小随父入鄂，至懂事理后奋发用功，博览群书，尤通史志。早年随父修撰有关县志，后结识当时著名大藏书家、文献学家朱筠先生，并随朱先生学文，得其赏识提携，司职国子监修志。

或许，章学诚是命定为方志学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的“世家”酷爱史志典籍，其父修撰县志十年余。而当时又逢

乾隆执政，这位“十全老人”不但“揆文奋武”，且好名喜功，以求后世传颂。他调集文坛巨匠编纂《四库全书》，还专设机构，花大量人力物力续编《大清一统志》。上行下效，各地亦竞相掀起修撰方志之新潮。章学诚一生专事于方志，当属顺时应势，也是“世家传习”和个人学识优长所在了。如此说来，一代方志学巨擘的诞生，算是天时地利之和与“时势造英雄”吧！

章学诚一生曾多次“秋闱”失利，时值40岁第七次乡试才“范进中举”，次年又在“春闱”和“廷对”中取进，总算达到了“登进士第”。但经艰难抉择后，仍毅然舍去唾手可得的知县之位，回归学问修志初心。虽无法参与国家层面如《四库全书》等修撰活动，但在修志风气炽热的乾隆盛世，省、府、县地方志这个大舞台还是可以任其施展才华的。他参与撰写了《国子监志》，主修了《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等诸多方志。

正是在多年修志实践中，他对自己的修志心得作了探索思考、归纳总结。早在协修《天门县志》时，他便提出了《修志十议》，对方志体例安排有了独特思考。29岁那年，他对各家的体例“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其著史学理论之志已然于心中萌生。后又积多年修志实践之经验，加上善于思索创新，便有了《校讎通义》《文史通义》两部大著问世。这是他对后世影响、贡献最大的学术成果，也是他实现由修志史家向史学理论家（主要是方志学）转身的重要标志。

《校讎通义》乃目录学著作。他对书目索引编制及提要撰写、著作目录目次及体例安排等方面，都作了系统而有创新的思考和探究，并在前人基础上，独创性地提出了目录学“溯流探源”或“按源索流”的主张，在方法上则更注重“互著”“别裁”，其学术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可以说是奠定他在史学界地位的扛鼎之作，并使其获得了中国方志学创始人之殊荣。他的方志“立三书”之论——“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

作文征”（《文史通义》卷六），是其方志学的基本脉络骨架，对方志学发展影响深远。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之说。方志由地而史，由史而论，终成方志之学，此乃章学诚宏大功业之所在。

章学诚的学问之道，为后世学者交口赞誉。他主张方志应为世所用，益于家国；学问之旨，在于治史鉴后，而非治经入官；“良史”应“才学识”三者兼备，“必知史德”，即“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他治学重启发、贵独创、主质疑、力辨析，一生所追求倡导的，只在于学术要经世致用、治学贵乎有所得。从学术、文化发展史讲，学术之精神，研究之要义，治学之生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有所创新，为文化长河贡献新知新识。章学诚的方志学说，就是学术创新之楷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一盏激励史学界、方志学界后人奋发前行的航标灯塔。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章学诚说过，方志和国史一起，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读史可以知兴替，唯继者方能开新。史志典籍，是我们这个“旧邦”灵魂的载体；继承发扬，是我们这个“旧邦”的老树新芽。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乃至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蒸蒸日上，新时代的方志人勇敢地突破古旧方志“一本书”的本本主义，开创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地方志事业新局。包括这些年来，浙江乃至全国各地方志学人深入研讨章学诚，继承弘扬章学诚治学精神，都可以说是浙江精神、中华文化“旧邦新命”的具体注脚。

我有幸曾在绍兴工作多年，亲身感受到绍兴历朝历代名人如林，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厚重。我对史学、方志从无研究，对学界绍兴名人章学诚先生，也只是闻其大家之名，而对其学问无多了解。但有一件与章先生多少有些关联的事，却让我记忆深刻。那是2006年的事。当时我率绍兴党政代表团去湖北学习考察，并在时任湖北省委主要领导关心下，专门到荆州古城作了访问，晚上抽空翻阅酒店房间里摆放的《荆州通志》，方知荆州方志的开创者即为章学诚。作为绍兴领导，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并因此而想到读书著

书之学问，也想到了做人做事做官之心骨。总之，那一夜感慨良多，至今难以忘怀。

正值中秋时节，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潘捷军先生，约我为即将面世的《章学诚研究概览》[由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推出]作个小序。这自然又让我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情结”。同时，又考虑到当今学界回顾总结百余年来的章学诚研究、特别是章学诚方志学术研究成果，将其编制成目录，并选取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萃集历代名家心血为一书，以期为后学者提供研究借鉴之路径，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事。于是，我便欣然答应试作小序。当然，对我来说，正可以借此表达我对绍兴籍学界名家——章学诚的敬仰之心。

在写作小序过程中，我重点参考了许伟君先生《思想的土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一书中的有关章节。特作说明并致谢。

是为序。



2018年9月16日于竺泉斋

（作者系中共绍兴市委原书记、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现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目录

阐“旧邦”以辅“新命”（序言）·····	王永昌	
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 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 ——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专稿·····	潘捷军	001
近代对章学诚方志编纂理论的扬弃·····	邱新立	010
章学诚方志学研究综述（1801—2018）·····	鲍永军	032
章学诚的方志学 ——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五·····	仓修良	060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乔治忠	072
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吕志毅	084
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来新夏	094
18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新成就 ——论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的辩证思想·····	罗炳良	111
续修：重温章学诚方志理论 ——纪念章学诚逝世200周年·····	梅 森	129
以史入志：章学诚方志学核心理念的再认识·····	钱茂伟	137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杨艳秋	143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刘 巍	159
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	董 平	209
论章学诚对历史哲学的探索·····	陈其泰	218
“六经皆史”的视角		
——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和卫国	246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	朱政惠 陈 勇	260
《周官》《春秋》与章学诚的史学·····	吴海兰	284
清廷国史《章学诚传》的编纂		
——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	戚学民	302
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再认识·····	沈松平	313
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经典价值·····	梁滨久	322
《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	钱婉约	333
释“章言史意”		
——章学诚史学史论述新解·····	章益国	346
章学诚研究著作论文目录选编（1801—2018）·····		364
章学诚简介·····		435
章学诚故居简介·····		436
章学诚纪念室简介·····		438

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 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

——纪念章学诚诞辰280周年专稿

潘捷军

【摘要】章学诚系引导中国近现代史志学术史的集大成者。一方面，他从“六经皆史”的史学论、广泛深邃的史义说和卓然不群的史德观等方面对史学研究作了精辟阐述，另一方面，他又以矢志不渝的方志编纂事业和独到精辟的方志学术理论为中国方志发展史作出了开创性重大贡献。在章学诚诞辰280周年之际，再度梳理和挖掘其史志学术思想，对推进“方志之乡”的史志编研事业发展和文化浙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 学术思想 探索与实践

浙江自古以来文化璀璨，名人荟萃，章学诚便是杰出代表之一。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今上虞道墟人，清代著名史学家及方志学家。章学诚历来被中外学界视为史志学科的集大成者，因而有“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等一系列高度评价。“但是，他的学术在当时缺少同仁和继承人，他的著作在身前以及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能得到很好地编订印行。所以，章学诚其人其学几乎隐没了

100年。”^[1]20世纪后，“章学诚在现代经历了一次被‘重新发现’的际遇”。^[2]特别在章学诚诞辰280周年之际，再度审视并弘扬其史学、方志学等领域的学术思想，不仅对推进新时期的史志编研事业和传承区域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文化浙江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浙东史学殿军”的历史贡献

章学诚的学术贡献首先体现在他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的意识和勇气而对乾嘉盛世史学流弊的抨击和学术创新。梁启超为此认为：“实斋之于史，盖有天才”，“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而且其为“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3]章学诚的史学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六经皆史”的史学论。“六经皆史”系章学诚代表性著作《文史通义》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关乎其对史学基本范畴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他还进一步强调“六经”乃为“史”与“器”，而非空洞无物的“道”，“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4]另一方面，在注重继承传统的同时，他又指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故“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这一观点被侯外庐认为是“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5]，因而也是对传统最有系统的反挑战和具有突破性的创见。

[1] 钱婉约：《〈章氏遗书〉与章实斋年谱》，《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

[2] 章益国：《论章学诚之“撰述”与“记注”》，《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

[3]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版（版本下同），第212页、第189页、第210页等。

[4]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原道下》，第12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版本下同）。

[5]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版本下同），第509页。

二是深邃精辟的史义说。“史义”即建立在史家对历史理解和对史学认识基础之上的研究宗旨与主观理念，关乎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要义。章学诚曾反复强调：“作史贵知其意”，“史所贵者义也”。他为此还作了这样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1]他同时断言：“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2]章学诚之所以注重和强调“史义”，还有其更深刻的蕴意，“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3]，而应借“义”经世，以“义”明道，包括“章氏‘六经皆史’之论，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4]，这既是对浙东史学经世致用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其理论之所以能超越前人的关键所在。

三是独树一帜的史德观。这也是其史学理论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史德观是对刘知幾“三长”论的继承。章学诚也认为“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5]，“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6]。另一方面，正因为意识到“兼三尤难”，他又明确指出：“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7]他认为史家心术不可不虑、心术不可不慎，如“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8]这对后世史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如胡适认为《史德》“其言极精”，梁启超、柳诒徵等均将史家之“史德”放在首位，等等，由此也可见章学诚的“史德”观对刘知幾“三长”论的提升与完善。

由上可见，章学诚由外而内，从形式到内容，从基本范畴到史义、史德，提出了系统创见，恰如其在《文史通义·原道》中所言：“竭其心思

[1] 《文史通义校注·方志立三书议》，第574页。

[2] 《文史通义校注·浙东学术》，第524页。

[3] 《文史通义校注·浙东学术》，第524页。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5页。

[5] 《文史通义校注·文德》，第279页。

[6] 《文史通义校注·史德》，第219页。

[7] 《文史通义校注·史德》，第219页。

[8] 《文史通义校注·史德》，第220页。

耳目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1]，从而在中国古代史学转型的关键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方志学术体系的创始者和奠基人

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逼于困苦饥寒”而“坎坷潦倒”，却矢志“志”不渝。他一生共主纂和参与编纂了12部志书，其中《湖北通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和《亳州志》由其主纂，正如梁启超所言：“其创作天才，悉表现于和州、亳州、永清三志及《湖北通志》稿中”^[2]。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创建了系统完整的方志学术体系，这也是其对中国史志事业最为重要的贡献。章学诚曾明确指出：“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风气之成也，心有所以蔽”，这也正是其革故鼎新的探索动力。^[3]为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过一系列评价，如：“‘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4]。

作为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的方志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明了方志的性质和作用，如他提出了“志属信史”的主张，并强调方志的首要功能在于“经世”，即垂鉴、惩劝和教化之作用。二是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如提出方志分立“三书”说。并说明“三书”中志为主体，掌故、文征是两翼，这也是其方志学精义所在。三是确立了志的体裁和相应内容，主要有纪、传、考、图、表等。四是辨清了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如明确提出“越境不书”说，这对澄清方志编修中越

[1] 《文史通义校注·原道下》，第138页。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第210页。

[3] 《文史通义校注·原学下》，第154页。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第209-210页等。

俎代庖、史志混用滥编等现象具有重要导向意义。

总之，在章学诚所创学术体系中，方志学研究相对来说最为深刻系统，成果也最为丰硕，故章学诚也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方志理论的集大成者。

三、独到精辟的史志关系理论

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视章学诚为史志学科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于他在史、志两门学科上各自所作的独到贡献，更重要的是他还在两者关系研究这一难点和焦点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从而使“史”与“志”既各为一学，又有机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一贡献不仅进一步彰显了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和方志学史上的地位，更对指导后世包括当代的史志编纂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如何认识并在修志实践中妥善处理史志关系是方志学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但长期以来，它又始终是困扰修志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又源于章学诚。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学界历来多将章学诚的“志乃史体”说奉为圭臬。确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等论著中曾多次阐明“志乃史体”“志为信史”“志者，史之一隅也”^[1]等观点。但认真梳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长期以来学界对章学诚的史志关系思想有所误读。事实上，“志”属于史的范畴但又不能等同于“史”，这才是其史志观的实质要义和精髓所在。

首先，应考察章学诚史志关系说的时代语境。如他曾指出：“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后）人忽之。”^[2]那么，“世（后）人”因何而“忽”？又“忽”在何处？其实梁启超也曾作过相应分

[1] 分见《文史通义校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821页；《和州志皇言纪序例》，第609页。

[2] 《文史通义校注·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第782页。

析：“春秋时，各国皆有史……由今日观之，可谓为方志之滥觞。”他为此还有“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等论断。^[1]可见梁启超其实也是依据古代中国行政区划实际情况所作的判断。即就今日中国行政区划格局而言，不少当初之“国”早已为现今的省级以至市县级行政区划所替代，在此意义上看，古国之史当然是“地方”之“志”，所谓时过境迁、与时俱进也。正如章学诚所言：“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2]。

其次，更重要的在于，章学诚又进一步强调：“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3]例如，他认为“志”与“史”当需“严名分”，即方志既需与史有所关联，又应“避僭史之嫌”；而且“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4]。还有，他之所以强调“今之方志，不得拟于古国史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史”，一定意义上恰恰在于“志”。他曾尖锐指出：“今言国史取裁于方志何也？”乃“今之所谓方志，非方志也”，“方志既不为国史所凭，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所谓觚不觚也，方志乎哉”！^[5]从而对方志的独特价值意义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三，为编好规范的“志”，章学诚还提出了一系列辩证理念和相应的编纂方法，例如：“志之为体，当详于史”^[6]，他认为：“志（虽）为史裁，（但）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7]从而在史志之间划定了较为清晰的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第206页。

[2] 《文史通义校注·州县请立志科议》，第588页、第589页。

[3] 《文史通义校注·方志立三书议》，第571页。

[4] 分见《文史通义校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825页；《州县请立志科议》，第588页。

[5] 《文史通义校注·方志立三书议》，第573页、第574页。

[6] 《文史通义校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821页。

[7] 《文史通义校注·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第861页。

界线。又如：“史体纵看，志体横看”^[1]，这种对两种体裁所作的概括性定位，显然直接影响了后世直至当代志书“横排门类，纵述史实”编纂原则的制定与遵循。再如“史文有讹谬，而志家订正之”^[2]。正因为两者具有“志为史基、史从志出”这种辩证关系，因而他又强调方志编纂应“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3]。进而达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之目的。

可见，章学诚不仅认为史志不可简单混为一谈，而且对两者关系作了一系列规范清晰的阐述，从而初步确立了方志学在史学总体框架体系中的地位，同时也为后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辟出了空间。

四、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处于清乾嘉盛世的章学诚，学术境遇与其身世一样十分坎坷，其理论创见在当时非但未被重视，反而备受质疑，屡遭诘难。如侯外庐就认为：章学诚的“学问不合时好，以致他的言行，在死后一直被埋没多年”^[4]。钱穆也认为：“实斋在当时亦有志矫风气，只因当时学风皆趋向经学，过分注重古经典之训诂与考订。彼力主研治史学，注重近代，提出‘经世致用’之新观点，用于补偏救弊……未能开风气，对当时学风未能有一番大振起，因而不能在学术界开一新局面。”^[5]其实就连章学诚本人也曾有“论锋所指，有时而激，激则恐失是非之平”之自省。但也正因章学诚“以贫贱之故，周流南北，于民生吏治，闻见颇真”^[6]的坎坷经历，同时

[1] 《文史通义校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828页。

[2] 《文史通义校注·永清县志列传序例》，第761页。

[3] 《文史通义校注·答客问上》，第470页。

[4] 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485页。

[5] 钱穆：《学术与风气》，《中国学术通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5册，第300页。

[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上韩城相公书》。

以其“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的敏锐意识和学术胆识，而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之举，因而百年之后的章学诚非但未被遗忘，反而备受关注，甚至在“被埋没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之后，“在现代（又）经历了一次被‘重新发现’的际遇”。

近代以来，学界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日益关注，如除梁启超等学者前述评价之外，浙籍著名史学家何炳松就认为“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内藤湖南认为《文史通义》是“历来这类著作中最精彩的一部”，研究者“绝不可轻易放过”。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称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史学天才，可以与阿拉伯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家并驾齐驱。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在《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一书中，也视章学诚为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表现出了罕见的、几乎是现代的思辨特征”。余英时则认为：“对史学本身及其有关各方面作有系统的哲学性的思考，则两千余年来，我们只能举出章学诚一人，而《文史通义》一书也是惟一的历史哲学的专著。”^[1]瞿林东、陈其泰等国内当代史家也有“其理论探索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确为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史家，是清代章学诚”等一系列评价。当然，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绝非十全十美，其时代局限性也在所难免，当下更无须全盘接受，但今天来重新发掘和认识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确有特殊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曾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指出：“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

[1] 余英时：《章实斋与柯林伍德的历史思想》，《余英时文集》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